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比较研究

饶宝美^{1,2}, 张乾元²

1. 琼台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00;

2.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在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和研究旨趣的差别决定了其研究方式的不同。马克思通过对费希特、黑格尔的批判以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实现由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并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恩格斯则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对共产主义革命之必然性的论证,完成了新的科学世界观的转型。他们道法分殊、殊途同归,并肩作战,共同创建与发展了革命性的科学世界观。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科学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4.06.00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4)06-0016-10

恩格斯在谈到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作用时曾谦虚地说,在与马克思出生入死的毕生奋斗中,他终究是“第二小提琴手”^[1],一再强调自己只起辅助的作用^{[2]248}。这样一来,人们往往因此而低估了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中所作的重要贡献。20世纪30年代左右,随着马克思早期几篇著述的公开出版,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争愈演愈烈,并引致了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合作关系的思考;后来随着国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的不断出版,尤其是其私人信件相继披露,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分歧愈加明显,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分工协作论”“完美合作论”等多种取向,

乃至形成了海尔布隆纳所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的复杂局势。比如,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卡弗针对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纂工作,质疑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完美”合作关系;泰克西埃^[1]则指出,“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分开,是何等的荒谬”^[1]。其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两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是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和研究旨趣的差别而呈现出研究路径与研究方式的分殊,但结果是殊途同归、命运与共的,最终达成了一致的理论见解,实现了共同的崇高目标。

收稿日期:2023-1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001);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YB)23-81]

作者简介:饶宝美(1981—),女,江西省抚州市人,琼台师范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张乾元(1965—),男,湖北省广水市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知识谱系,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是各自独立地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其中,相比于恩格斯的转变,马克思的转变似乎更具有理论特质。诚然,不能由此认为: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看起来更显直接的现实性;又或者是在1842年秋来到英国之后,恩格斯才开始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事实上,恩格斯向新立场的转变,早在赴英国之前就已开始。

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和研究旨趣的差别决定了其研究方式的不同

马克思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着自由思想氛围的律师家庭,其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把追求民主自由和人类幸福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既攻读法学也痴迷哲学,并在甘斯的影响下全力投入黑格尔哲学的“怀抱”,特别注重对其辩证法的研究。这点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这样说:“如果抽象的个别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那么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由于个别性在事物本性中不居统治地位,当然就被取消了”。^{[4]63}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总体上正确地规定了自我意识哲学及其基本的性质,但同时他也认为,那主要被称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妨碍了这位大思想家理解自我意识哲学的重要性。因为抽象的个别自我意识使得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成为不可能,也使得所谓理智之中普遍的超验之物统统破灭。因此,如果把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之下作为其自身表现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原则,那么就会为僵化迷信的神秘

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可见,黑格尔哲学在这里起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使得当时有着明确自我意识哲学立场的马克思意识到抽象的主观性有它的局限,黑格尔哲学从总体上来讲成为基督教最后的辩护、最后的神正论。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在一个纺织厂厂主家庭中成长,束缚于虔诚主义的思想教育,中学尚未毕业便辍学经商,较早接触到了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恩格斯辍学来到资本主义较为发达、思想比较自由的不来梅当学徒后,很快就投入了具有鲜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特点的青年德意志运动。1839年3月,恩格斯匿名发表《伍珀河谷来信》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并抨击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指出虔诚主义是工厂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工厂主的护身符。特别是他到了英国后,新的环境促使他深入调查研究社会经济关系问题。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成长路径不同,也必然导致二者研究方式、侧重点的不同。

2. 马克思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首先,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青年马克思通过对费希特、黑格尔的批判,最终实现了对黑格尔的颠覆与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青年马克思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在1837年加入了“博士俱乐部”,随后积极投身于青年黑格尔运动。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希特哲学的研究而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对费希特的退守与奉迎、以企图把意识与存在和人与环境割裂开来的问题。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坚持了黑格尔关于意识与存在不可分割的观点。他指出:“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

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4]75}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强调了历史进程作为哲学意识同经验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4]76}的重要论点。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中,马克思以其对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辩证观点,部分地克服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性。后来,这种世界观发展为马克思从事政治活动的指南。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构成了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的比较稳定可靠的一个出发点、一个开端,其基本观点虽带有黑格尔哲学的色彩,但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彻底无神论的倾向^[6],而且反映了他反对因循守旧的保守观点,力图超越黑格尔哲学的独创精神^{[5]27}。1841年,马克思完成其博士论文,恰逢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这本书对当时先进的思想界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与鼓舞作用。同样地,它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尽管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中汲取诸多的养料,但通过对社会生活问题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对它们却抱着高度批判的理性怀疑,也促使了他逐渐与“自由人”(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主要写了三篇政论,即《评普鲁士最近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主要是讨论国家和法的问题,并从法学的原理、哲学的原理来谈论物质利益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真正方面并没有接触到。除禁猎法可以从法学方面来加以研究外,“地产析分”纯粹是经济方面的事情,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来看,这些是非常难以处理的。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崇高而思辨的,其唯心主义体系使得人与自然截然地分

离开来,历史发展的动力被寄托于客观化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鞭挞,整合了人与自然的纽带联系,但其对宗教异化的分析却过度偏向于自然、忽视了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在1843年初发表的关于教育理念改革的论文使马克思找到了颠覆黑格尔体系的绝佳方法,一场新的哲学革命就此爆发。正如阿维内里所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兴趣与他最初对黑格尔的迷恋具有同样的系统性。费尔巴哈的思想承诺‘实现’哲学。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假设的这种认识,现在可以通过运用费尔巴哈的方法来解决黑格尔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来实现。”^[6]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一系列激进的政治斗争和所见证的大量社会事实,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把握到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从而动摇了其对黑格尔关于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的观点的信仰。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他写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得出与社会实际生活相一致的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7]591}对物质利益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使马克思的观点“降到地面上来”了,这为马克思“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创立唯物史观铺就了第一块基石”^[4]。

其次,青年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

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双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8]¹⁵ 马克思在文中首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消灭任何奴役、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阶级,并论述了他自己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哲学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头脑”,而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心脏”——现实力量。彻底的革命带来人的解放,而没有哲学的指引,无产阶级就无法翻身;同样地,没有无产阶级的觉醒,哲学也无法实现自我。^[8]¹⁶ 马克思关于哲学与无产阶级如同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的论断,由于未从其历史条件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所以主要还是抽象的、理论性的概念范畴。

3. 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首先,恩格斯开始突破唯心主义的界限,为创立唯物史观作了理论铺垫。

与青年马克思一样,青年恩格斯当时也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恩格斯于19世纪30年代末与宗教信仰彻底决裂,在斯特劳斯的著作《耶稣传》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识到历史向着自由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与青年德意志运动分道扬镳,追随费希特转向青年黑格尔派。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出版的时候,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很兴奋,一度认为他们已经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不是先探讨政治问题然后探讨社会问题的,而是从英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问题开始的。恩格斯这一时期著述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德国、法国尤其是英国的社会革命的,他的所有其他观点都围绕着

这一问题而逐渐形成,并随之而不断发生变化。

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是矛盾的:既承认原则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基础,并强调原则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在1842年11月底写于伦敦的《国内危机》一文中,对原则和利益何者优先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社会革命在英国不可避免,因为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进行的,而非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9]。这就是说,物质利益在一定意义上是革命的决定因素。这样,恩格斯就开始突破了唯心主义的窠臼。

1843年10月至1844年1月中旬,恩格斯撰写了《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在该文中恩格斯对卡莱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宗教观进行了批判。恩格斯认为,卡莱尔的观点“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10]⁵¹⁶,阐明“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10]⁵²⁰。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强调生产的发展、物质利益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不是用暴力统治别人,而是激励别人,引导别人”^[10]⁵²²,批判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论述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

其次,恩格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第一次从经济方面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恩格斯第一次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分析经济学范畴,并且,“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11]。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

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10]446}。也就是说,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为私有制所决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二者是沆瀣一气的。恩格斯根据对历史和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本质的研究,理解到经济现象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至少在现代历史中是如此),是阶级矛盾产生的基础,而阶级矛盾又成为政党、党派斗争的关键,进而构成全部政治史的基石。同时,恩格斯在《大纲》中率先提出“两个和解”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10]449}。这一思想对马克思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和哲学观点产生了积极影响。

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10]442},私有制就此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入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认为这种发展归根结底决定于生产关系的发展。恩格斯清晰地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活和斗争的。他这样写道:“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占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占有过活。其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10]469-470}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由于财产集中的规律“是私有制所固有的”,现实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任何法律,土地占有的任何分割,资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无济于事……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10]470}。最后,随着阶级斗争激烈程度不断升级,社会革命的爆发也就成为必然。由此,恩

格斯得出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结果的结论。这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从经济方面论证共产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尝试。

尽管恩格斯这时还受到黑格尔思辨方法的影响,还未区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对李嘉图的经济学评价较低,但《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恩格斯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而自豪,也无愧于马克思的赞誉: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7]592},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12]112},“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13]。显然,恩格斯这时已经基本上以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严肃分析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14]56}。

二、在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和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同时,恩格斯也已开始建立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

恩格斯在《大纲》中从经济学方面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步探讨,较为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背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本质,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等基本范畴,并使之更为具体、更为完善,进而“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11]80}。

1. 受恩格斯《大纲》的影响,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

受恩格斯《大纲》的启发,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之后即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入分析,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写作的。《手稿》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轫,也

是马克思思想秘密的诞生处。经由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并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分析有所不同,马克思在《手稿》中着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路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深藏着异化劳动的内在矛盾和关键症结,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得劳动力转变成了商品,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被物化了,这是对自然社会关系及其普遍人性的扭曲与摧残,这就使一切人首先是工人非人化,工人的生产劳动使其真正的人的本质丧失了。但是,资本家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化而堕落为极端残忍与贪婪的掠夺者。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相异化,“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2]157};工人并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而是为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所支配;工人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变成工人谋生的手段;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成为人与人相异化的集中体现。因而,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和标志。

2.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达成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对于异化与异化劳动,马克思在《手稿》中秉持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所强调的关于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最基本实践类型,并由此对黑格尔绝对精神发展范型的深入批判得出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事实上,黑格尔已看到通过生产实践以改变自然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但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绝对精神显现为人与自然的终极基础,所以其中的关于人的生产活动

蜕变成了精神劳动的某种形式。显然,黑格尔在将人、自然界和人类的历史体系化的同时,也将其思辨化与神秘化了。为此,要想建构全新的、正确的科学世界观,就必须从最鲜活具体的社会现实性去理解与把握人和自然界。马克思由此揭示了:人的类本质、人类社会的基石、人和自然界之间的桥梁,以及人们改造自然界和改造自身的动力绝非什么精神,而正在于作为人类生活基础的生产实践。与动物截然不同的是,人能够依赖知性、理智和愈益精深的科学技术体系认识到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并通过不断地改造自然,使之日益满足人的合理化需要。生产劳动实践使自然界、人及其人类社会同时得到改造,这正是人类历史的本质内涵。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地提出,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从这种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将整个人类历史区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是非人的时期,指三大阶级社会(包括异化劳动占统治性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史前历史时代;第二个是真正的人的时期,基于私有制的异化劳动被消灭了,异化劳动者转变和提升为“真正的”人,人们过着契合人的本性、符合人的真正本质的生活。

3. 恩格斯开始建立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

《手稿》是马克思大约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间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紧接着,在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也写就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篇文章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在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唯物史观进一步形成的过程和对唯心主义的自觉的批判意识。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以英国为例,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格局,指出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是怎样被决定于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的。

这些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在马克思文本中相对较抽象的甚至带有空想色彩的理论观点。

《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这两篇文章代表了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初次合作之前其个人思想发展的顶峰。当时,唯物主义观点已经被运用于英国现代史,而且在许多方面具备了普遍的形式,因为恩格斯从当时英国状况中越来越清楚地把握住了其历史发展的必然特点和基本方面,并认为其他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情况也大致如此。恩格斯指出:“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长此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15]85}

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详尽地探讨了利益问题。他认为,私有制的统治必然使利益变为私有的、利己的东西,并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四分五裂,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以达到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恩格斯就此预言说:“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10]572}

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中,恩格斯指出,“英国的最近将来是民主制”^{[10]584},但这里所说的“民主制”不是“过去那种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10]584}。在历史线索上,英国社会的发展事实就是铁的证明。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着一切财产、垄断了所有的资本利益,无产阶级与广大劳苦大众则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故此,“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成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10]585}。但是,人民的斗争决不限于建立不能治愈社会痼疾的所谓单纯的民主制,而是旨在趋向于社会的民主制。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因此,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

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社会主义原则。”^{[10]585}众所周知,恩格斯在此处并没有在民主概念前使用“资产阶级”的限定词,但很显然,他实际上已经把握住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阶级本质,他公然宣称自己是阶级社会私有制与作为私有制统治形式的国家(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对者,他已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并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科尔纽^[16]总结说,恩格斯“从工业革命这一观点对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状况的分析,引导他完全独立于马克思并以马克思不同的方式,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这本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恩格斯于1842—1844年侨居英国期间的政治文章,标志着他开始建立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也标志着他已转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立场。《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述已经包含了初步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也获得了将先进的哲学理论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的政治信念。

三、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丰富与发展其新的世界观

如果说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束缚,那么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就显露出了不断对这种影响和束缚的摆脱与超越。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分析了鲍威尔关于批判的批判与法国的唯物主义,并对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为形成中的唯物主

义历史观提供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与原理框架。这样一来,他们的新的世界观得以逐步完备和不断成熟。

1. 马克思基于实践观的新哲学

1845年,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该《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2]219}。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确地指出,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更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普遍人性或生物本能,而是自觉的、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实践既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也是认识发展的基础;既是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标准,也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不仅是认识论上的真正革命,而且是整个哲学革命变革的主要范式之一。

马克思从新的世界观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从而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半截子”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坠入了唯心主义泥潭^{[12]530}。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经由革命的实践,才能彻底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难题。作为类存在物、作为实践的个体,人不可能脱离或超越社会,人的本质必须被理解为其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而,对于社会问题、宗教问题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践”范畴就成了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枢纽或钥匙。基于实践观点,一种新的哲学观点形成起来,它与旧哲学观点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认为:对世界的解释只是前提和铺垫,改造世界才是关键和目的。

2. 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独创性贡献

与马克思的哲学研究路径不同,恩格斯从对历史发展的分析中探求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这使马克思正在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

一步完备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他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合乎规律地产生的,同时又如何合乎规律地出现了两个新的互相敌对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恩格斯在其中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他指出:“对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的利益而颁布的……法律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柱。”^{[15]118-119}但是,对工人来说,法律“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15]119}。无疑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时代总结,并凝聚了恩格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贡献。尽管在这部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痕迹,但它也最能说明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恩格斯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3.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全面创建新的世界观

1845年4月初,恩格斯从巴门来到布鲁塞尔,再次会见了马克思。两位朋友惺惺相惜,确定他们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当时,马克思大致向恩格斯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共同决定全面制定新的世界观,以此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来对抗德国哲学代表人物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个计划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获得了圆满实现。《形态》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出发,在分析各个主要历史时期时又按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前提、观点本身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他们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物质生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决定性作用的原理,也首次从实质上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交往形式)发展的辩证机理。这一极其重要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正日益不断完善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深刻把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质的钥匙。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发现可以概要性地归纳为以下几条基本原理:特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与其相适应、相作用的生产关系类型(交往形式);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特定阶段时,必然与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获得最终解决;而一种与更发达生产力相适应的新交往形式将替代已成桎梏的旧交往形式;随之,新交往形式又成为更新生产力的发展桎梏,并经由全面彻底的革命为更进步的新交往形式所取代,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样,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依次更替的各个阶段之间,形成了一种承续性的联系,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演进成为自然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道:“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2]567-568}这个矛盾的发现对于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之前揭示了经济关系决定政治、法律等关系,那么现在则确定了什么东西决定经济关系本身,进而揭示了历史过程更深刻的基础:归根到底,生产力决定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社会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如果说之前他们指出了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现在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个基础本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各重要方面之间的关系机制,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内部互相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得到了深刻的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的发现,为我们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解和社会历史

的发展分期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标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激发的社会革命,作为历史演进的基本动力,决定性地推动了社会形态的过渡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就这样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完成了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四、结语

2020年,适逢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国内众多学者纷纷就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发起隆重纪念活动,许多学者在纪念文章中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关系再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美。基于此,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活动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比较分析与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结论。

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两人的思想和工作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又各具特色、珠联璧合,进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之时,资产阶级理论家就曾经口诛笔伐、大搞文字狱,妄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对立。20世纪40—50年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仅制造“两个马克思”的谎言,而且说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观点和其代表的结论有矛盾;或者说恩格斯只是通俗地宣讲与附和马克思的观点,贬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的作用。现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胜利,那些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人更是挖空心思采用更加狡猾的手法,通过伪造和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手法,来达到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险恶用心。

其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患难与共、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在两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事业中,内在包含着他所作出的独立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哲学、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

义理论等基本领域,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奠基性作用的见解和新的科学发现,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

其三,在马克思思想观点形成的每个阶段上,恩格斯都既合作又独立地作出了自己的理论创建,以博学的研究领域和深刻的研究见解使马克思的观点更趋完备、锦上添花。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基于鲜活的实践调查和具体的历史分析,使马克思富有浓郁理论性质和思辨色彩的抽象观点不断充实和完善,使之更具体化、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因此,恩格斯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作用的评价是十分谦虚的,既彰显了他对马克思的敬仰与怀念,也蕴涵了其虚怀若谷、心胸广阔的伟人情怀。故而,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和马克思并肩作战,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出了决定性的重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这座神圣崇高、庄严宏伟的纪念碑上,在“卡尔·马克思”的大名旁边,永远不可磨灭地镌刻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光辉姓名。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19.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泰克西埃. 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革命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 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28.
- [6] AVINERI 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51.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列宁. 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37.
- [14]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135-136.

[责任编辑:侯圣伟]



引用格式:饶宝美,张乾元.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比较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6):16-25.